

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特别报道



保亭林亚金老人。对于那场60多年前的噩梦，她穷尽一生也无法摆脱。



从2005年起,《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先后寻访并跟踪拍摄了23位海南“慰安妇”幸存受害者,用镜头和文字向世人呈现了这些老人难以言说又震撼人心的惨痛经历。对黄一鸣拍摄的海南“慰安妇”,著名作家韩少功如此评价:“他用黑白语言发掘历史,记录了日军侵华时期‘慰安妇’的悲怆命运,对暴力和强权再一次给予了无声的控诉。虽是无声,但我们可以从很多镜头中听到作者的一声叹息,听到作者全身血涌的呼啸之声。”

## 海南“慰安妇”幸存受害者： 苦难和屈辱的 血泪诉状

文图\黄一鸣

杨亚榜老人说,她曾遭受过的耻辱和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2005年摄于保亭,2006年6月老人去世)

2005年5月,当我第一次用相机接触到被日军蹂躏的“慰安妇”幸存受害者时,那一张张充满屈辱的脸仿佛汇聚成了对日军的血泪诉状,虽然地点不同,遭遇不同,但她们因日军造成的苦难却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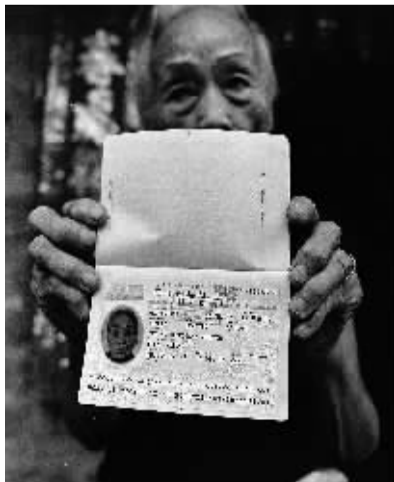
此后两年,当我寻访到多位当年如花似玉的“慰安妇”时,出现在眼前的都已是身患残疾、满脸风霜的老阿婆了。这些海南“慰安妇”多生活在偏僻山区,常年被头痛、腰痛、腹痛、肢体残疾等病魔缠绕,生活艰难。有的一生未能生育,日子过得孤苦伶仃。当时,她们年纪最大的87岁,最小的也已经80岁,好几位老人都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60多年前耻辱的阴影中,心灵备受煎熬。虽然悲剧已经过去60多年,但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时时折磨着她们。被迫成为“慰安妇”的陈林村老人在采访时紧紧拉着我的手,眼泪不断从失明的双眼涌出来,“我说,我说出来,我要控诉日军的暴行……”颤动的声音从老人紧闭了60年的双唇跳出,我知道做出这一决定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容易。而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批老人把苦难深藏至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才能承受如此生命之重啊?惨遭蹂躏的“慰安妇”们身为受害者,却自认无颜面对亲人和邻里。有的“慰安妇”因此不愿回忆过去,更不愿面对镜头。在陵水“慰安妇”陈亚扁的寻访中,我前后去了五六次,和老人谈心,带老人寻医问药,赢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组老人的纪实照片。有的老人,甚至在接受采访后不久就去世了,带着一生的不幸,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影像。

我也遇到过迫于家庭和社会压力,不便透露曾为“慰安妇”的老人,从她们那种欲言又止,伤痛抽搐的脸上,我能感觉到,几十年来她们生活在怎样的一种苦痛之下,而我又何尝愿意让悲剧再回放一遍呢?沉默地度过余生也许是她们最无奈的选择,所以我只能强忍着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默默地离开。

回想采访拍摄海南“慰安妇”的历程,虽然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但在一次次被她们哭诉的故事触动之后,我身上仿佛又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于是继续马不停蹄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不断寻找日渐老去的“慰安妇”老人,进行抢救性的采访拍摄。如何将这故事告知天下?如何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她们?如何为她们抱不平,让她们在有生之年看到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成功?几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无数次在梦中看到那一张张哭泣的脸,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陵水黄有良老人。2001年,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个站在日本法庭上,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和赔偿。



陈亚扁老人曾两赴日本作证。

